

试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詹素平

(井冈山学院, 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中体西用”的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留学教育的推行,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世界。

关键词: 洋务教育; 中学; 西学;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05-02-0042-06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中国社会迈入近代化的进程,是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伴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始终,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撞击下,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转变为近代教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实现。最终,近代教育完全取代了传统教育。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就是洋务教育,尽管它还处于借鉴和模仿西方教育制度的阶段,但已经具有中国近代教育的雏形。可以说,中国的近代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没有洋务教育,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基础。它影响着近代中国以后的教育改革,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教育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主要是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开始的,而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其实质是人才的近代化。洋务教育也是如此。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1](P691)}。这是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但却是“变之聚至,圣人所不能防”的。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统治阶级中产生了洋务派,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教育改革就是其主要内容。因为“教育之兴废,为国家强弱所

由系,教育之良否,为人民智昧所由分;东西各国莫不注重教育,合力通筹,以立强国智民之本”^{[2](P1012)}。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不断叩击中国教育,而且传教士也开始在华设立近代教会学校。洋务派认为,传统学校已成了科举制的附庸,而科举制此时已腐化到了极点,因此必须改革科举,学习西学。他们不仅能够面对现实,敢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的先进性,而且还看到掌握这种先进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了。^{[3](P30)}

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清王朝处于封建统治没落时期,却仍自高自大,直到“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蹙,人心始自危……”^{[4](P44)}。但是,顽固派对于西学始终采取拒绝的态度,对于洋务教育的各项改革横加阻拦。杨廷熙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恐西学之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3](P29)} 倭仁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3](P29)}

李鸿章认为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在于士人沉溺科举功名,不重技艺。“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3](P63)}。奕訢 1866 年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时指出:“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

收稿日期: 2005-06-02

作者简介: 詹素平(1963-),男,江西乐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5](P13)}反驳倭仁:“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又本之天文度数,参以勾股算法,故能巧法其中。”^{[3](P30)}冯桂芬曾批评科举制“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6](P2)}。郑观应抨击科举制:“自学者鹜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3](P48)}

洋务派顶着压力推行教育改革,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教育改革指针,在要求改革科举考试的同时,大力开办学堂和派人出国学习,以培养对外交涉和各类实用性人才。使近代教育第一次出现了较大发展。

(一)创办新式学堂

由于外交、洋务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需要新的人才,而新的人才又必须由新的教育来培养,因此洋务派把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文”“西艺”,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先后创办了37所洋务学堂。可分为三类:

1. 外国语教育学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以培养翻译、外交人才。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1893年湖北自强学堂等。

奕訢等洋务派认为:“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7](P119)}才能“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7](P115)}李鸿章说:“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7](P126)}要求创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官办的最早的一所外语学校。李鸿章道出了创办同文馆的用意:“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7](P126)}“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7](P127)}

1865至186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被聘为英文教习和翻译教习,年薪1000两白银,1869年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 Hart)的推荐,任总教习,直到1894年。继任者是欧礼裴(O-

liver)。1862年同文馆成立时,只有英文馆,第一任教习是包尔腾(Burdon),汉文教习是徐树琳。1863年设立法文馆、俄文馆,第一任教习分别是司默灵、柏林(A. Popoff)。1872年设德文馆,第一任教习是第图晋(Titouskin)。1866年添设算学馆,第一任教习是李善兰。1896年添设东文馆,第一任教习是杉几太郎。算学馆设立后的主要课程:算学由李善兰任教;化学由比利干(M. A. Billequin)任教;万国公法由丁韪良任教;医学生理由德贞(Dr. Dudgeon)任教;天文由海灵敦(Harrington)费礼饬(Dr. Fritzche)任教;格致由欧礼裴任教。

2. 军事教育学堂。学习西方近代陆海军技术,以培养能掌握、制造及修理近代先进武器装备的军事人才。如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州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等,1895年湖北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等。

1867年由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军事学校。到1874年,所培养的学生中,有掌握技艺的专门技术人员27名,设计部门技术领导8名,轮机长14名,教师2名。

3. 科技教育学堂。学习机械制造、矿山、电讯等技术,以培养能生产、操作和维修的各项专门技术人才。如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堂,1867年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福州电气学塾,1879年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1889年广东西艺学堂,1892年湖北矿业学堂、湖北工程学堂,1893年天津西医学堂、南京铁路学堂,1895年山海关铁路学堂等。

因为洋人垄断技术,占据要位,常常以此要挟,使中国人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尴尬地位。“督斯役者,以迄员董工匠,一无所知,重听命于洋员而已矣。”^{[8](P107)}因此必须加紧培养技术人才,“树人如树树,惟恐迟暮。”^{[8](P155)}奕訢认为:“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7](P121)}“夫中国之宜自强,至今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7](P121-122)}因此洋务学堂中,技术学校占了较大的比重。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堂”是中国人1865年创办的最早的一所技术学校。有些技术学堂主要也为军事服务。如李鸿章在奏天津西医总院“遵照海军章程接续开办”折中提出医院培养的学生“俾学成后,派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尤为北洋各

医院之根本^⑨(P17)。

(二)留学教育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内洋务学堂培养的人才不能完全满足或者胜任。因此十分重视留学教育。认为留学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⑩(P23)。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在《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中说:“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⑪(P162)。这样,洋务派把派人出国学习视为与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一样同等重要。

左宗棠认为:“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借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⑫(P903)

沈葆桢、李鸿章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指出:“闽厂前学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⑬(P165-166)他们认为:“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问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于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日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⑭(P165)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始于1847年,在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塞缪尔·布朗的安排下,该校有三个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其中,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提前回国,黄宽于1849年赴英国攻读医学专科,七年后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容闳于1850年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但它是自费留学,而不属于政府行为。

1868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了包括目的、年龄、计划、教学和管理、经费在内的留学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

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充之。”^⑮(P86-87)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按此计划实行,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潮。

1872年夏末容闳先期赴美安排。8月11日,陈兰彬率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同行的还有中文教习叶绪东和容云甫、翻译曾兰生。1873年6月12日,黄胜率第二批幼童赴美,同行的还有7名自费留学生。1874年9月19日,祁兆熙率第三批幼童赴美。1875年10月14日,邝其照率第四批幼童赴美,同行的还有3名自费留学生。这样每批30名、总数120名幼童,全部按计划派赴美国学习路、矿、工、机等学科。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正副公使,先后改派区谔良、容云甫、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

但到1881年,由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排挤,再加上清政府偏信了留学监督的“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术,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沾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⑯(P166)建议,下令将留学生一律遣送回国。在当时回国的94人中,21人在电报局学传电报,23人留用于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其余50人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尽管还没有毕业,但因为留学生们在美刻苦钻研,大多有收获,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人物或技术骨干。如京张铁路的设计者、享誉世界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将《唐诗》译成英文的第一人蔡廷干,江南造船厂第一任厂长邝国华,中日甲午战争中荣立战功的舰队司令吴应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等。

清政府还向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陆海军,1876年派出卞长胜等7人,1877年派出35人,1882年为10人,1886年为34人。从欧洲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他们大多数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经济、科技、外交、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⑰。如被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船政学堂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和总办、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左翼总兵兼镇远号

管带、后任提督林泰曾,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带林永生,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天津水师学堂教习、烟台海军学校的创办者萨镇冰。同时也开始以进修和专科学习等方式向法、德、英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派遣学生和工艺徒。

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1860-1895年),经洋务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共有209人。^[14]

二、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派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指出:“教育之兴废,为国家强弱所由系,教育之良否,为人民智昧所由分;东西各国莫不注重教育,合力通筹,以立强国智民之本。”^{[2](P1012)}从洋务教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教育兴起的道路:面对列强侵略,为了加强国防,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官员力主谋求富国强兵,积极发展军事教育,带动以军事教育服务为目标以推动其他教育的发展,从而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本雏形。它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教育与文化,是一对孪生儿。教育的勃勃生机,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而教育的僵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衰亡。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中国文化教育也与世隔绝。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潮流“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世界近代化运动中来了”,^{[15](P87)}中华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出现了严重危机。洋务派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因为它排斥科学技术,以致出现“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16](P258)}。

洋务派认为,只有建构一种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机制,即以民族文化教育为基础,用包容百家、兼收并蓄的胸怀融合、改造外来文化,充实和更新传统文化教育。冯桂芬率先提出:“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17](P888)}郑观应进一步指出:“中国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7](P899)}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8](P556)}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3](P53)}洋

务派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主张在维护儒家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必须改革科举考试,引进和学习西学。而张之洞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将它上升到“富国强兵”的高度:“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17](P962)},“西国之强,强以学校”^{[17](P963)}。

通过与顽固派的激烈较量、斗争,洋务派最终在传统教育中撕开了裂口,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新理念。它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保证。结果,民间出现了仿效洋务学堂方式创办的新式书院,原有的传统书院也引进西学,尤其是清末新政成果之一的“癸卯学制”的核心就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新学制出现,就是以制度的形式肯定洋务教育。从某种程度看,“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和推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确保了主体地位,并防止了中国近代教育在改革中全盘西化。

2. 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早期新式学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意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在客观上把教育与中国近代化的需求结合起来。

在课程内容上,一改传统教育的单一内容,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包括了基础课、专业课、实习课三类课程。在基础课中数学几乎是各个专业的必修课,物理、化学等课则依专业的不同而有选择地开设,专业课是实用技术知识的传授,实习课是学习知识之后的实践。洋务派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13](P63)}。洋务教育中所引进的西学课程,是纳入儒学的框架内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廷的批准。不仅中国是这样,在欧洲也如此,“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13](P22)}。

最先引进西方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1866年增设算学馆后,开设了算学、天文、地理、格致、化学、医学、文学、国际公法等课程。这是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15](P13)}。“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又本之

天文度数,参以勾股算法,故能巧法其中^{[3](P30)}。而“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尚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5](P13)}。其它学堂也大致如此。严复在船政学堂所学课程多达19门: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维、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19]而福州船政学堂还倡导学生在学习之余,开展体育活动,更是传统教育所没有的。据《申报》报道:“船局后学堂,去冬设有秋千两架,及皮球、鸡毛燕等件,以为学生早晚游戏之具^{[20](P536)}。随着洋务教育的不断发展,西学课程的比例和时数逐年增加,到了洋务运动后期西学课程总时数要占80%,甚至90%。^[21]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多年的美国人丁韪良谈到京师同文馆创办的意义时说:“同文馆的间接影响是很大的,他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5](P183)}。‘新教育的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校——同文馆。^{[22](P36)}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将传统教育的个体授课制改为班级授课制。“建立独立于传统教育体制的新型小学和预科学校成为当务之急^{[9](P489)}。最先采用班级授课制的是京师同文馆。按年龄、程度分班,规定每年所学内容,由浅入深,逐年升级。年龄小的学制八年,年龄大的学制五年(跨越第一至三年内容)。学习内容为: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在管理体制上,改变了传统教育的管理方式,引进了西方的新式管理制度。设有总教习、教习、提调、助教、苏拉等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在京师同文馆,对教师、学生、考试、日常管理甚至伙食都有一套制度。如要求学生“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7](P129)}。‘讲求实学,磨砺真才,广见闻而开风气。’“诸生宜束身自爱,专意讲求,毋慕浮华,毋沾习气^{[7](P125)}。在考试方面规定:每月初一举行月课;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初一日举行季考;每年

十月岁试;每届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上海广方言馆规定:“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三等者记情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7](P129)}。江南制造局的工艺学堂‘除汉文、英文、算学、画图四事仍照旧章办理外,其余拟请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23](P508)}。

3.留学教育的推行,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世界

留学教育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适应世界形势,主动地学习西方,由封闭走向开放。洋务派十分重视留学教育,把派人出国学习视为与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一样同等重要。他们认为留学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0](P23)}。曾国藩、李鸿章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派学生出国留学:“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授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此中奥,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因此,“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7](P162)}。‘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7](P161)}。沈葆楨、李鸿章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指出:“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于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日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7](P165)}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始于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在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塞缪尔·布朗的安排下,前往美国留学。但这是自费留学,而不属于政府行为。在1872—1875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潮,在容闳、黄胜等人率领下,清政府派送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国学习路、矿、工、机等学科。此外,还向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陆海军,并开始以进修和专科学习等方式向法、德、英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派遣学生和工艺徒。曾国藩、李鸿章认为选拔最合适的学生是留学教育成功的关键:“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

材难。^{①7(P162)}在得到清政府同意后,专门在上海设公局操办此事,生源限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13-20岁的聪颖幼童,且“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①7(P163)}。

留学生们刻苦钻研,大多有收获,“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经济、科技、外交、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①13}。如京张铁路的设计者、享誉世界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经洋务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共有209人。^[14]

在列强入侵、民族面临危亡的近代中国,洋务派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积极推动教育改革,证明了教育对于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衰以及国家的存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洋务教育有局限性,但不能按当今的条件来苛求他们。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24(P154)}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5]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6]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Q·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8]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A].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9]郑登云.中国近代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10]容闳.东学西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11]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2]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A].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 [13]洋务运动(八)[A].中国近代史[J].人大复印资料,1995,(6).
- [14]黄继宗,于醒民.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派遣[J].华东师大学报,1984,(4).
-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阎国华,刘虹.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 [16]张文襄公全集(一)[M].北京:中国书店,1990.
- [1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2·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18]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19]杨齐福,于冠生.试论洋务学堂的兴起及其影响[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1,(5).
- [20]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21]洋务教育评议[J].史学月刊,1987,(6).
- [2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23]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24]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The Discus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Wsternization Movement to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ZHAN Suping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the Westernization education's idea of "To build up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main part and make west learning serve for our Chinese people" becomes the guideline thought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The emergence of new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gives impetus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Oversea education pushes forward the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to the world actively.

Key words:Westernization educ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learning